

# 新媒体与政治参与： 以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为例

郑沅教

## 摘要

本研究通过弹劾朴槿惠总统烛光集会这一具体事例，尝试对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此，在网络问卷调查后，对此次事件的实证数据进行了路径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不仅对弹劾集会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比起其他影响参与弹劾集会的变因，如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尽管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没有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显著影响，却对政治知识的增加存在明显影响。与此同时，社会信任通向弹劾集会参与的路径显示出显著的影响，而政治信任对弹劾集会参与未产生显著影响。在不同媒体对弹劾集会参与的影响力方面，代表性社交媒体——脸书的影响最大。

## 关键词

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新媒体、社交媒体、政治参与

## 作者简介

郑沅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原韩国联合通信社记者、原韩国国民日报北京常驻记者。电邮：wkchong89@naver.com。

本文是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写成的。

## The Influence of New Media Use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cusing on Candlelight Rally for the Impeachment of President Park Geunhye

CHONG Wongyo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probe in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th the unprecedented candlelight rally for impeaching of President Park Geunhye as its research objective. To this end, this study conducted a web survey and utilized path analysi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inding i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political use of new

media would cast a direct impact on the impeaching rally, it would outweigh other variables that also influence on impeaching rally such as social trust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 its sway. Though political use of traditional media bungled in displaying an evident role on the rally, i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enhancement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trust would show a significant impact through path of participation to the impeaching rally whereas political trust stops short of imposing a conspicuous impact on impeaching rally. When it comes to sway imposed on the rally by varying media, Facebook, a representative social media, played the biggest role.

### Keywords

Impeachment of Park Geunhye, Candlelight rally, New media, Social medi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Authors

Chong Wongyo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 former reporter at Yonhap News Agency in Korea; a former Beijing correspondent at The Kukmin Daily in Korea. E-mail: wkchong89@naver.com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f the author.

## 一、提出问题

弹劾总统朴槿惠烛光集会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一起暴力事件，聚焦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弹劾烛光集会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4月共举行了23次，从位于首尔心脏的光化门广场到韩国各地。累计共有近1700万市民参加（JTBC，2017.12.6）。强烈的民意震撼了国会议员，12月3日第6次弹劾总统朴槿惠烛光集会举行后第6天，即2016年12月9日，国会通过了弹劾总统朴槿惠的议案。2017年3月10日，宪法法院全票通过朴槿惠弹劾案<sup>1</sup>。

舆论报道称烛光集会的和平进行是多亏了媒体。其中包括社交网络服务（SNS，Social Network Sites）在内的新媒体，做出了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巨大贡献。市民们使用智能手机，在“脸书直播”（facebook live）上实时直播集会的进行情况，与网民线上沟通。

智能手机与新媒体的结合就像这样大大改变了使用网络的市民运动和政治参与的形态。烛光集会的过程中，市民们使用的新媒体包括脸书、推特、Kakao Talk、YouTube、网络电视、播客、博客等。烛光集会最终实现了和平政权交替，现在被称为“烛光革命”。烛光革命简单来说就是在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百花齐放中获得成功的（Bowman & Willis，2003）。

在韩国,对于新媒体是否引导了市民进行政治参与,学者们意见有所不同,但是近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两者之间有着积极的关系。这些研究以各种各样的形态进行,包括从新媒体使用到政治参与的过程与原因(김은이, 2013; 심홍진, 2012)、新媒体使用者的新闻使用组合与社会政治参与(조은희, 2014)、新媒体使用与市民参与的关系(최연태·권경환, 2017)。

对于社交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外国学者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在研究。其中涉及到的主题范围很广,包括新媒体使用对政治参与产生的效果(Bimber & Copeland, 2011; Kenski & Stroud, 2006; Xenos & Moy, 2007)、新媒体使用与知识差距(Eveland & Scheufele, 2000)、社交媒体与社会资本的关系(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的关系(Bourdieu, 1986; Brehm & Rahn, 1997; Coleman, 1988; Putnam, 1995a, 1995b; Scheufele and Shah, 2000)等。

但是这些研究根据其不同的主题,很多也显示了相悖的结果。而且将弹劾总统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常见的。本研究因此将重点放在以下问题上。第一,比较对于弹劾总统烛光集会的参与,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与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相比,哪个发挥的影响力更大。这里之所以明确强调“政治性使用”,是因为先行研究已经证明娱乐性使用等出于其他目的的媒体使用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甚微。第二,按照不同的类型分析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对参与弹劾总统烛光集会所产生的影响。第三,确认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对弹劾总统烛光集会参与产生的影响。为了研究上述问题,本研究对实证数据进行了路径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 二、理论背景

### (一) 政治参与的类型

学者们将政治参与的类型分为“常规性参与”和“非常规性参与”(Barnes & Kaase et al., 1979; Milbrath & Goel, 1977)、“选举参与”和“选举外参与”(이숙종·유희정, 2010; Rosenstone & Hansen, 1993)、“合法参与”和“不合法参与”(Verba, Nie & Kim, 1978)等,或者分为“线上参与”和“线下参与”(김희조·조재호, 2015; Gil de Zuniga, Jung & Valenzuela, 2012)。有的学者将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的媒体分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研究(김현정·원영아, 2015),有的学者将特定媒体作为研究对象(신소연·이상우, 2012; 이동희·황성욱, 2013; 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Valenzuela et al., 2009),还有部分研究认

为使用媒体的组合不同,对政治参与产生的效果也不同,故而提出媒体组合(media repertory)的概念,应用到研究当中(Wolfsfeld, Yarchi& Samuel-Azran, 2016)。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在各种政治参与类型中,属于非常规性线下政治参与。

## (二)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分

媒体技术的进步大大改变了媒体用户参与政治的方式和形态,因此有必要根据媒体的不同发展类型探讨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最典型的方法就是以互联网的出现为分界点(김성태·김여진·최홍규·김형지, 2011)。一般来说,我们将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即报纸、收音机、电视以及杂志等划分为传统媒体一类,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只能单方面传达信息。因此,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难以主动利用媒体去参与政治。

随着互联网逐步兴起,为了和传统媒体区别开来,我们一般将此后出现的媒体称为新媒体。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新媒体使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产生很强的双向互动性。当然这是Web2.0时代的产物。而在Web1.0时代,媒体借助互联网只能单方面传递信息。以媒体网站、门户新闻网站为例,它们虽然是以互联网为平台,但仍然只能单方面对外发布信息。Gadi Wolfsfeld等学者(2016)指出,从媒体使用效果方面来看,以缺乏互动的信息检索为主的互联网使用与传统媒体并无不同。因此本研究将媒体网站、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也与报纸、电视一起分为了传统媒体。

以网络为平台的媒体中,微型博客和SNS也实现了活跃的双向交流。推特和微博属于微型博客,脸书、Kakao Talk、微信则分属于SNS。而微型博客、SNS、博客、YouTube、通讯服务(messaging service)等都统称为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然而,也有很多人将社交媒体和SNS这两个词进行混用。正是此类社交媒体,如今已经成为了新媒体的主力军。除了上面提到的脸书、推特、Kakao Talk、博客之外,本文也将播客(Podcast)和网络电视纳入新媒体的体系之内,共同分析这些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三) 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与政治参与

为明确媒体对政治参与造成的影响,需将媒体的使用目的限定为政治性目的或信息性目的。Katz and Gurevitch(1974)将个人使用媒体的目的分为监视(信息获取)、自我认同感确立、发展社会关系以及娱乐四个方面。相关研究表明:在个人层面上,以监视和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媒体使用会对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参与产生积极作用;而以娱乐或消遣为目的的媒体使用则不会对社会资本和参与产生影响,



亦或者带来消极影响 (McLeod, Scheufele & Moy, 1999)。Shah等学者 (2001) 则主张, 尽管媒体的信息性使用可以使市民参与 (civic engagement) 增加, 但是以娱乐或消遣为目的的媒体使用会减少市民参与。Shah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表示, 网络的信息性使用与社会资本、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Shah, Kwak & Holbert, 2001; Shah, 2005)。对此, Gil de Zuniga (2009) 称“对社会资本和参与造成影响的并不是媒体本身, 而是使用媒体的方式”。

但是, 当不将新媒体的使用限制于政治性 (信息性) 目的时, 新媒体是否会引导市民们的政治、社会参与, 在学术界可谓是众说纷纭, 即出现了所谓的“动员论 (mobilization theory)”和“强化论 (reinforcement perspective)”两大观点。

“动员论”主张互联网的使用对政治参与具有积极性影响, 尤其对年轻人更是如此 (Andolina et al., 2001; Keeter & Zukin, 2002)。与此相反, “强化论”主张新媒体 (互联网) 和电视一样, 起到强化对政治参与产生的消极性影响 (Cummings et al., 2002)。

对此, Gil de Zuniga, Molyneux & Zheng (2014) 分析了社交媒体的信息性使用 (informational use) 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表明, 社交媒体的信息性使用不仅能直接影响线下政治参与, 在社交媒体上, 为形成社会关系表达政治观点时, 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政治参与, 都能产生间接影响。新媒体的信息性使用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参与产生了影响, 报纸 (McLeod et al., 1999)、电视 (McLeod et al., 1999; Norris, 1996) 等传统媒体也一样 (Gil de Zuniga et al., 2014)。

韩国的许多学者 (이병혜, 2013; 천혜선 · 박남수 · 이현주, 2014; 최연태·권경환, 2017) 也曾对社交媒体的政治性使用 (或信息性使用) 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过研究, 他们的研究表明, 社交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可以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以此为基础, 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1-1) 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 可能对参与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产生了直接影响。**

**研究假设1-2) 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 可能对参与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产生了直接影响。**

#### (四) 媒体使用、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

利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获取大量的政治信息, 在此过程中便会逐渐积累政治知识 (political knowledge)。近来, 新闻单位和门户网站等新闻媒体意识到社交媒体正成为重要的新闻供给渠道, 并增加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推送量, 这样一来人

们使用社交媒体时接触到政治信息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就这样以互补的方式,在增加政治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Wolfsfeld等研究人员(2016)发表研究结果称,传统媒体在政治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表明,新闻的获取能够丰富民众的政治知识(Jung et al., 2011; Kenski & Stroud, 2006; McLeod et al., 1999)。

特别是报纸、电视、收音机、杂志等传统媒体在通过硬新闻(hard news)来帮助增长政治知识上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Gil de Zuniga et al., 2014)。McLeod等学者(1999)的调查表明,阅读报纸等印刷媒体的民众与他人进行政治讨论的意向更为强烈。

在此过程当中,不仅政治知识得到了积累,民众的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也会随之提高。因为随着对政治理解的加深,他们会逐步相信自己在政治过程中具有影响力。Kenski和Stroud(2006)通过对美国总统选举舆论调查资料(2000 NAES)进行的研究,证明了网络使用和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Wolfsfeld等学者(2016)指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都会在政治效能感的形成中发挥积极作用。

以此为基础,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2-1)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会对政治知识的积累产生积极影响。

研究假设2-2)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会对政治知识的积累产生积极影响。

研究假设3-1)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会对政治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

研究假设3-2)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会对政治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

政治知识不仅能通过提高政治效能感间接促使政治参与(정낙원, 2013; Wolfsfeld et al., 2016),还能直接影响政治参与(Boulianne, 2016; Gil de Zuniga et al., 2012),亦能是直接和间接影响政治参与(Jung et al., 2011)的中介变量。本文以此为基础,为保持简明性(parsimony)、避免模型复杂化,选择了政治知识提高政治效能感,并间接影响政治参与这一理论。

研究假设4)政治知识水平会对政治效能感产生积极影响。

政治效能感作为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变量,降低了市民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和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成本(Gil de Zuniga et al., 2012)。因此,政治效能感被看作是与政治参与紧密相连的最为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Cohen et al., 2001; Delli Carpini, 2004; Gans, 1967; Kenski & Stroud, 2006; 转引自Nakwon Jung et al., 2011)。韩国的许多研究也表明,政治效能感与

投票（김무곤·김관규，2004）、线上请愿（박상호·성동규，2005）等各种政治性活动存在着密切联系。하종원（2006）表示政治效能感对线下和线上的政治参与都有一定影响。

以此为基础，对政治效能感和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线下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5）政治效能感可能对参与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 （五）社会信任与市民参与、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

市民参与被定义为旨在解决共同体问题而进行的个人或团体性的活动（Zukin et al., 2006）。政治参与的定义有很多种，简而言之就是对政府的行为和政府决策带来影响的行为（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市民参与是在选举参与或政党及工会活动等传统方式的政治参与逐步衰退，而个人化新形态参与逐步兴起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Bennett, 2012; Zukin et al., 2006）。一般来讲，市民参与具有非政治属性，且相较于政治参与而言更具有广泛性。

对此，有必要对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和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的概念进行说明。社会信任一般是指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人际信任（对他人的信任）（금희조，2009），而政治信任强调的是对政治制度和政策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김상돈，2006）。Newton（2001）表明，社会信任是以对他人的直接经验为基础的，而政治信任是通过媒体间接获得的。

Brehm和Rahn（1997）指出，社会信任（人际信任）和市民参与（非政治性社会参与）是互相影响的关系。市民参与意味着非政治性的参与，其虽与政治参与区分开来，但是作为副产品，最终还是会演变为政治参与。Inglehart（1997）表示，部分非政治性的市民参与能够起到增强人际关系网、提升对共同体的好感，从而提高对政治过程的关注度的作用，由此可与政治参与相衔接。

综上所述，社会信任能起到提高市民参与度的效果，而根据政治社会状况，市民参与也可能表现出政治参与的特性。参与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就属于这一情况。这里将社会信任与市民参与、政治信任与政治参与分别区分开来提出假设。

**研究假设6）社会信任度越高，可能对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的参与程度越高。**

关于政治信任，学者们关注市民对国家机关，特别是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取决于民众对政治系统如何运作所做出的评价。因此，政治信任会受到失业率、通货膨胀、政治腐败、战争胜负、经济发展、犯罪率等因素的影响。总而言之，对政府的信任与政府的业绩密切相关（Mishler & Rose, 2001）。

Kaase (1999) 表示, 政治信任度较低的市民虽然通常不太积极参与政治, 但他们对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no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显得更为积极。Hooghe和Marien (2013) 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制度性政治参与尽管与政治信任有着正向关系, 但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与政治信任是反向关系。

韩国学者当中이숙중等人 (2010) 的研究表示, 政治信任度越高, 选举参与度越高; 政治信任度越低, 集会示威参与度越高。由以上先行研究为基础, 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7) 政治信任度越低, 可能对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的参与度越高。

### 三、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模型

本研究以理论背景中揭示的内容为基础, 提出以下研究模型。本研究以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参与作为因变量。用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社会信任、政治信任4项作为自变量。尽管已经有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会受到媒体使用或政治效能感影响的研究结果, 此处为了模型的简洁明了, 没有将这一路径包含到研究模型中。中介变量使用了政治知识和政治效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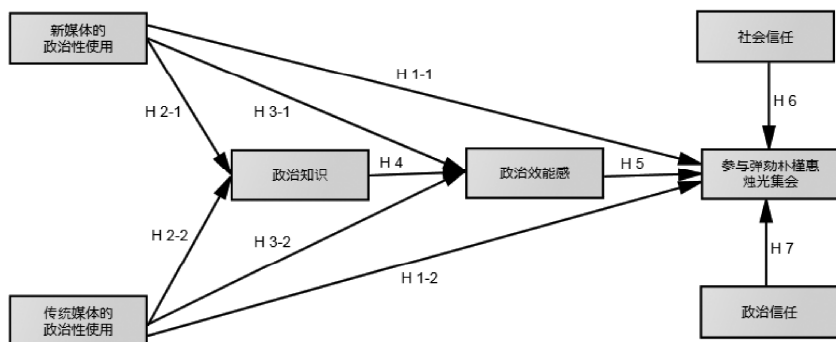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

#### (二) 资料收集

本论文的网络问卷调查 (Web Survey) 利用了舆论调查机构“韩国调查 (Hankook Research)”的专业被调查人库 (panel) 进行。韩国调查是韩国领先的舆论调查机构。截止2017年10月, 在韩国全国拥有专业被调查人库<sup>2</sup>达到40万人。为保证本调查的代表性, 以各性别、年龄的人口普查 (Population Census) 标准进行了配额抽样 (quota sampling)。因此, 将参与弹劾朴槿惠总统烛光集会的256人与

未参与者256人，共512人作为研究对象。问卷调查在2017年8月17日至8月23日的7天之内，以韩国调查拥有的专业被调查人库中，韩国全国范围内的20周岁以上成年男性和女性为主体进行。

韩国调查为了进行问卷调查，共发送了47400份邮件，其中打开邮件的专业被调查人有14220人，实际回答了调查问卷的人为2133人。但其中1129人在回答完调查问卷全部问题前中断了回答，另有未如实回答的被调查人8人。不诚实的回答是指尽管自始至终完成了调查，但出现了在所有的项目中均选择了同一选项等情况，并在最终的数据中被排除在外的样本。另外，被调查者中有484人在目标样本数已满之后参与调查，因此也被淘汰。经过上述过程，最终收集了512份样本。

问卷调查收集到的资料根据韩国调查的检验流程，经过了检验与编码（Coding），之后通过统计软件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得到了数据文件。被调查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详见表1。

表1：被调查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项目	分类	N（%）	项目	分类	N（%）
年龄	20-29岁	96（18.8）	收入水平	250万韩元以下（1人民币 = 170韩元）	98（19.1）
	30-39岁	101（19.7）		250-250万韩元	98（19.1）
	40-49岁	122（23.8）		350-500万韩元	147（28.7）
	50岁以上	193（27.3）		500万韩元以上	169（33.0）
性别	女性	251（49.0）	政治倾向	进步	162（31.6）
	男性	261（51.0）		中立	284（55.5）
教育水平	大学专科及以下	176（34.4）		保守	66（12.9）
	大学本科及以上	336（65.6）	弹劾集会参与	否	256（50.0）
				是	256（50.0）

（三）变量的测定

1. 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作为因变量的弹劾烛光集会参与以“您是否参与过弹劾总统朴槿惠烛光集会？”的问题进行测定（0：未参与、1：参与了）。对23次弹劾烛光集会的参与程度，分为了：1）1-2次；2）3-4次；3）5-6次；4）7-9次；5）10-12次；6）13-14次；7）15次以上。并以7分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了分组测定。其中将“15次以上”设置为7分，是因为判断在深冬，气温达到零下的寒冷天气中，参加10次以上已经是非常高的参与度了。



## 2.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

本研究的自变量使用了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社会信任、政治信任这4项。

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以“在新媒体(Kakao Talk、脸书、推特、网络电视、博客、播客)上发布政治相关内容或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论、分享、点赞的频率是?”通过7分李克特量表进行了测定(1:完全不、2:几乎不、3:非常偶尔、4:偶尔、5:经常、6:较频繁、7:一直)。这一测定问题参考了신소연·이상우(2012: 208)所用的关于脸书、推特使用的调查问题。

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以“在过去的一周内通过传统媒体(报纸、电视、新闻媒体网站、门户网站新闻页面)接触政治相关新闻的频率是多少?”通过7分李克特量表进行了测定。在此将금희조·조재호(2010: 358)为测定传统媒体使用设置的问题进行了部分修改后使用。

社会信任以“您一般认为人们可以信赖吗?”通过7分李克特量表进行了测定。这是Newton(2001)、Kasse(1999)、Uslaner(1999)等许多研究中也选用过的问题。韩国也有주미영(2016: 93)与금희조(2009: p18)等许多学者通过对人际信任进行提问的单一问题进行测定。

政治信任以“您对政府(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是否信任?”通过7分李克特量表进行了测定。政治信任在先行研究中一般采用通过对政府的信任度进行测定的方式。但是对于政府的范围是仅限于行政部门,还是包括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各研究中都是不同的。这里이숙종·유희정(2010: 295)将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包含在政府范围内,对各个机关的信任程度进行测定后求出了平均值。주미영(2016: 93)提出了针对整体政府的信任的单一问题。Newton(2001)通过“对议会的信任”进行了政治信任的测定。本研究中选择了对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部门的广义政府的信任进行提问的方式。

## 3. 中介变量 (Mediator variable)

本研究使用了政治知识和政治效能感这2个中介变量。政治知识共提出了7个问题(韩国总统任期、韩国执政党的名称、朝鲜导弹名称、韩美自由贸易协定、韩国国务总理的名字、日本总理的名字、英国总理的名字),然后按照每道题答对为1分、答错为0分来计算,如果全部回答正确,则为7分。在此,用政治时事问题和政治家名字进行提问的方式,参考了금희조·조재호(2015: 464)与Wolfsfeld等人



(2016: 2104) 当中的内容。

政治效能感通过“有充分资质参与政治”“对韩国社会面临的政治问题很了解”“有信心像其他人一样做好公共事业”的3个问题按照“1: 完全不、2: 几乎不、3: 非常偶尔、4: 偶尔、5: 经常、6: 较频繁、7: 一直”的选项通过7分李克特量表进行了测定。在“我在与其他人谈起政治话题的时候偶尔会感到没有自信”“我认为政治非常复杂, 不了解政治是如何运作的”这2个问题上按照7: 完全不、6: 几乎不、5: 非常偶尔、4: 偶尔、3: 经常、2: 比较频繁、1: 总是的选项通过7分李克特量表进行了测定。由此评判分数越高, 政治效能感就越高。政治效能感的5个问题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891, 非常高。政治效能感计算了5个问题的平均值( $M=4.24$ ,  $SD=\pm 1.24$ )。这些问题使用了금희조·조재호(2015: 465)当中的内容。

#### (四) 分析方法

对研究模型的评价, 用表示设定的模型与实际数据间的一致程度的拟合指数来进行。即, 为了评价建立的研究模型和实际调查的样本资料间的适配性, 本研究模型的拟合优度评价使用了 $\chi^2$  (Chi-square)、属于绝对拟合指数(Absolute Fit Index)的GFI (Goodness Fit Index)、AGFI (Adjusted Goodness Fit Index)与RMSEA (Root Mean Squared Error Approximation)、属于增量拟合指数(Incremental Fit Index)的NFI (Normed Fit Index)、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各拟合指数的判断标准是: GFI和AGFI一般在0.9以上即表示拟合优度较高(Kline, 2005), RMSEA在0.05以下被认为是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Bollen & Long, 1993)。属于增量拟合指数的NFI、CFI一般在0.9以上时被认为是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Hu & Bentler, 1999)。模型的推定使用了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ML), 对本研究的间接效果的显著性检验则在所有资料都按照正态分布的假设之下进行了检验显著性的Sobel test (Preacher & Hayes, 2004)。

为了分析研究的普遍特征, 描述统计分析与逻辑回归分析使用了SPSS 23.0, 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使用了Amos 23.0。

## 四、研究结果

### (一)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显示, 平均年龄为43.08岁。在7分制基准下, 集会参与次

数的平均分为1.64。这表示集会参与次数大概在“①1~2次”和“②3~4次”的中间。即,平均集会参与次数略超过2.5次。智能手机使用程度的平均分为6.38,在7分制基准下的“⑥使用非常频繁”和“⑦一直在使用”中,高于⑥而低于⑦。这意味着智能手机的使用非常活跃。

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在7分制基准下的平均分为3.23,高于“③非常偶尔”而低于“④偶尔”,略低于7分制基准下的中间水平。而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平均分为5.07,在7分制基准下,略超过“⑤经常使用”。这一结果表明,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比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更为频繁。社会信任平均分为4.04,略高于7分制基准下的中间水平。政治信任平均分为3.33,在7分制基准下,略低于社会信任的平均分。政治知识平均分为6.05,在7分制基准下得分偏高,而政治效能感平均分为4.24,高于7分制基准下的中间水平。

当研究模型中使用的所有变量的偏度(skewness)绝对值小于3且峰度(kurtosis)绝对值小于10时,变量的分布满足多元正态性(multivariate normality)假设(Kline, 2005)。

## (二) 弹劾集会参与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这个路径分析与实际资料的拟合优度除了 $\chi^2$ 以外,其他几项的拟合优度处于好或一般水平,详见表2。

表2: 研究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拟合优度	$\chi^2$	df	GFI	AGFI	RMSEA	NFI	CFI
研究模型	47.523	9	.975 <sup>a</sup>	.922 <sup>a</sup>	.092 <sup>b</sup>	.875 <sup>b</sup>	.893 <sup>b</sup>

注: a好 b一般

本研究中,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RH1-1)对弹劾集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beta = .205$ ,  $p < .01$ ),而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RH1-2)对集会参与未起到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频率越高,弹劾集会参与度也越高。

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和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通向政治知识的路径都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RH2-1, RH2-2)。新媒体或传统媒体使用得越多,政治知识水平也越高,但无法判断这两种媒体中哪一种对政治知识水平的提高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表示这两个变量的路径系数( $\beta = .083$ ,  $\beta = .165$ )之间差异的卡方(Chi-square)变量( $\Delta\chi^2$ )未显示出显著的差异( $\Delta\chi^2 = 2.056$ ,  $p > .1$ )。

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和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通向政治效能感的路径都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RH 3-1, RH 3-2）。新媒体或传统媒体使用得越多，政治效能感也越高。从政治知识到政治效能感的路径也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RH 4）。政治知识水平越高，政治效能感也越高，但无法区分这三个变量（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政治知识）分别对政治效能感产生多大的影响。同样因为表示这三个变量的路径系数（ $\beta = .315$ ,  $\beta = .334$ ,  $\beta = .148$ ）之间差异的卡方变量（ $\Delta x^2$ ）未显示出显著差异（ $\Delta x^2 = 2.568$ ,  $p > .1$ ）。

政治效能感和社会信任通向弹劾集会参与的路径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RH5, RH6）。政治效能感和社会信任度越高，弹劾集会参与度也越高。而政治信任对弹劾集会参与未产生显著影响（RH7）。

综上所述，除了研究假设RH1-2和RH7以外，其他假设RH1-1、RH2-1、RH2-2、RH3-1、RH3-2、RH4、RH5和RH6均成立。特别是通过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直接影响的变量可知，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越多，政治效能感越高，社会信任度越高，弹劾集会参与度也越高。

为了比较这三个变量的路径系数，进行了等值约束。结果表明，三个变量间的路径具有显著差异（ $\Delta x^2 = 8.149$ ,  $p < .1$ ），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的影响大小顺序是：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 $\beta = .205$ ）、社会信任（ $\beta = .105$ ）、政治效能感（ $\beta = .098$ ）。这意味着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对市民参与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产生的影响最大，因此更值得关注。

与此相比，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RH1-2）和政治信任（RH7）通向弹劾集会参与的路径未显示出显著影响（ $\beta = .008$ ,  $\beta = .067$ ）。这意味着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和政治信任未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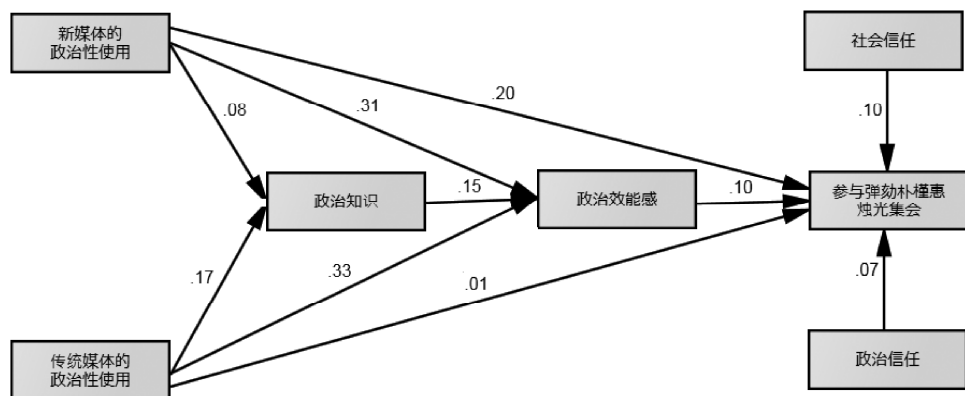


图2：路径模型

表3: 路径分析结果

路径	$\beta^1$	S.E.	C.R. <sup>2</sup>	$\Delta x^2$ (df)注
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弹劾集会参与	.205	.015	4.490 <sup>a</sup>	8.149(4) <sup>c</sup>
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弹劾集会参与	.008	.017	.179	
政治效能感→弹劾集会参与	.098	.020	1.982 <sup>b</sup>	
社会信任→弹劾集会参与	.105	.019	2.312 <sup>b</sup>	
政治信任→弹劾集会参与	.067	.018	1.485	
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政治知识	.083	.027	1.902 <sup>c</sup>	2.056(1)
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政治知识	.165	.030	3.768 <sup>a</sup>	
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政治效能感	.315	.031	8.324 <sup>a</sup>	2.568(2)
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政治效能感	.334	.035	8.745 <sup>a</sup>	
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	.148	.051	3.904 <sup>a</sup>	

<sup>a</sup> $p < 0.01$ , <sup>b</sup> $p < 0.05$ , <sup>c</sup> $p < 0.1$

1Standardized estimates

2Critical ratios for differences

注: 在 $\chi^2$ 分布表中, (当 $p=0.01$ ,  $df=4$ 时,  $\chi^2=13.28$ ), (当 $p=0.05$ ,  $df=4$ 时,  $\chi^2=9.49$ ), (当 $p=0.1$ ,  $df=4$ 时,  $\chi^2=7.78$ ), 所以当 $\Delta \chi^2 > \chi^2$ 时, 该路径的群组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在 $\chi^2$ 分布表中, (当 $p=0.01$ ,  $df=1$ 时,  $\chi^2=6.63$ ), (当 $p=0.05$ ,  $df=1$ 时,  $\chi^2=3.84$ ), (当 $p=0.1$ ,  $df=1$ 时,  $\chi^2=2.71$ ), 所以当 $\Delta \chi^2 > \chi^2$ 时, 该路径的群组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在 $\chi^2$ 分布表中, (当 $p=0.01$ ,  $df=2$ 时,  $\chi^2=9.21$ ), (当 $p=0.05$ ,  $df=2$ 时,  $\chi^2=5.99$ ), (当 $p=0.1$ ,  $df=2$ 时,  $\chi^2=4.61$ ), 所以当 $\Delta \chi^2 > \chi^2$ 时, 该路径的群组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 (三) 各类媒体对烛光集会参与的影响

为考察各种类型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使用是否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影响, 本文进行了二元逻辑回归分析。

如表4所示, 在Model 1的新媒体类型中, 脸书、播客、网络电视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 脸书、播客、网络电视使用得越多, 弹劾集会参与度也越高。

在Model 2的传统媒体类型中, 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门户网站新闻页面使用得越多, 弹劾集会参与度也越高。Model 3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类型对弹劾集会参与的影响大小顺序依次是: 脸书( $\beta = .275$ ,  $p < .01$ ), 门户网站新闻页面( $\beta = .221$ ,  $p < .01$ ), 播客( $\beta = .182$ ,  $p < .05$ )。

在Model 1中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影响的网络电视在Model 3中其影响力消失。这是因为Model 3中放入了所有新媒体类型和传统媒体类型而未对传统媒体类型进

行控制。综合这一结果可得知,在各类媒体中,脸书、门户网站新闻页面、播客和网络电视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了正向(+)影响。

表4: 影响弹劾集会参与的主要媒体因素<sup>1)</sup>

变量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beta^+$	S.E. <sup>‡</sup>	OR <sup>§</sup>	$\beta^+$	S.E. <sup>‡</sup>	OR <sup>§</sup>	$\beta^+$	S.E. <sup>‡</sup>	OR <sup>§</sup>
Kakaotalk	.027	.083	1.027				.048	.084	1.049
Facebook	.288	.078***	1.334				.275	.080***	1.317
Twitter	-.138	.090	.871				-.111	.092	.895
Internet TV	.108	.061*	1.114				.098	.064	1.103
blog	-.001	.090	.999				-.028	.092	.973
Podcast	.205	.084**	1.227				.182	.086**	1.200
报纸				.074	.055	1.077	.026	.060	1.026
TV				-.037	.072	.964	-.042	.078	.958
媒体网站				.009	.072	1.01	-.088	.079	.916
门户网站新闻页面				.245	.076***	1.277	.221	.081***	1.247

注: 1) 基础类别 (base category): 未参与, <sup>+</sup>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up>‡</sup>Standard error, <sup>§</sup> odds ratio

\*p<0.1, \*\*p<0.05, \*\*\*p<0.01

## 五、结论与讨论

### (一)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将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具体事例作为因变量,实证分析了对此产生影响的变量,在这一点上具有一定意义。主要分析结果显示,韩国与外国现有研究基本一致。

第一,本研究显示,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不仅对弹劾集会(非常规性线下政治参与)产生了直接的显著影响,而且比起其他变因(如社会信任和政治效能感)对参与弹劾集会产生了更大的直接显著影响。其中新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对弹劾烛光集会参与产生直接影响的部分符合Gil de Zuniga, Molyneux & Zheng (2014)关于社交媒体的信息性使用对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进行的分析结果。Gil de Zuniga et al. (2014)表示,社交媒体的信息性使用不仅能直接影响线下政治参与,在社交媒体上,为形成社会关系表达政治观点时,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政治参与,都能产生间接影响。此时,表达政治观点充当的是中介变量的角色。韩国的许多学者(이병혜, 2013; 천혜선·박남수·이현주, 2014; 최연태·권경환, 2017)也曾对社交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或信息性使用)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过研究,他们的研

究结果表明, 社交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可以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 研究结果显示, 尽管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没有对参与弹劾集会产生直接影响, 却对政治知识的增加有明显影响。这符合Dimitrova等人(2014)的主张, 不同种类的媒体, 其优先的功能存在差异, 并且对于知识方面, 比起社交媒体, 被分类为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的使用是更有效的, 而对于政治参与来说, 社交媒体的作用更大。

韩国学者금희조·조재호(2015)在研究通过媒体(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进行的新闻使用与对话对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及政治参与产生的影响时发现, 借助社交媒体(新媒体)的信息性使用和沟通能对政治参与带来重大影响, 传统媒体对政治知识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三, 尽管社会信任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了直接的显著影响, 但政治信任对弹劾集会参与未产生影响。社会信任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了影响的部分, 与Kaase(1999)、Brehm & Rahn(1997)的研究一致。Kaase(1999)通过1981-1996年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资料, 以西欧9国为对象进行了研究, 证明了个人之间的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作为社会资本, 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有着正向关系。Brehm & Rahn(1997)主张社会信任(人际信任)和市民参与(非政治性社会参与)是互相影响的关系。

而政治信任对弹劾集会参与未产生影响的原因, 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解释。首先, 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是通过社会信任形成的市民参与和通过政治信任形成的政治参与混杂的情况, 两种路径难以明确区分, 被认为是造成影响的原因之一。社会资本理论学者们将传统政治参与也视为广义市民参与的一部分。其次, 也可能是因为测定指标或标本的差异。对照这一情况, 有必要对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细的研究。

第四, 政治效能感在通向弹劾集会参与的路径中, 表现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而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产生正向影响的研究结果已有许多。韩国国内研究表明, 政治效能感与投票(김무곤·김관규, 2004)、线上请愿(박상호·성동규, 2005)等各种政治性活动存在着密切联系。外国学者(Cohen et al., 2001; Delli Carpini, 2004; Gans, 1967; Kenski & Stroud, 2006)也将政治效能感看作是与政治参与紧密相连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第五, 本研究认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对政治效能感与政治知识的形成产生正向影响的观点, 在先行研究中也得到了确认。Kenski和Stroud(2006)



通过对美国总统选举舆论调查资料（2000 NAES）进行的研究，证明了网络使用和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正向关系。Wolfsfeld等学者（2016）指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都会在政治效能感的形成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Jung et al., 2011; Kenski & Stroud, 2006; McLeod et al., 1999）都表明，新闻的获取能够丰富民众的政治知识。

第六，不同媒体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的影响力方面，代表性社交媒体脸书最为突出。此外，新媒体中的播客、网络电视也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传统媒体中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影响。其中脸书突出的原因，被认为是通过脸书朋友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动员效果（mobilization effect）”。另外，通过脸书直播（Facebook Live）参与集会的市民们可以实时提供现场情况的视频，这也被认为是原因之一。播客因为通过智能手机可以随时接触到影音文件，是深受年轻一代<sup>3</sup>喜爱的媒体。播客之所以是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影响的媒体，与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弹劾集会中于20-29岁群体的参与率较高的事实有关。传统媒体中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影响，表示市民们为了搜索崔顺实垄断国政等与弹劾集会相关的新闻，也较多地使用了门户网站的新闻页面<sup>4</sup>。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与建议

### 1. 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研究中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时，将调查对象设置为了20周岁及以上。因为政治舆论调查时，通常将20岁及以上作为调查对象。但是在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中，不足20岁的青少年的参与也不少。这一现象，在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减少被认为是当下阻碍韩国社会的民主主义发展的课题的背景下，是值得关注的。因此，如果将20岁以下的10余岁青少年也包含在调查对象中的话，可能会得到更符合现实的结果。那样的话，可以在研究模型中将10余岁的群体作为其中一个群体包含进去。由此就可以对10余岁青少年的政治参与相关行为模式和意识进行了解。

### 2.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新闻受众具有普遍在属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媒体中同时消费几种媒体，即以媒体组合（media repertoire）形式进行消费的倾向。也就是说，大多数媒体消费者会同时使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以进行信息获取和传播，以及政治意见交换。在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中，参与者通过脸书等新媒体了解集会现场的实时情况，或互相分享对“朴槿惠崔顺实门”的政治见解，他们通过JTBC等综合编成电视台接触朴槿惠崔顺实门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消息<sup>5</sup>。与此同时，参与者也可以通过报纸阅读相关

的综合分析新闻。Wolfsfeld等(2016)表示,为了获取政治信息而同时使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话,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因此政治信息库变得更丰富,政治知识和政治效能感水平也变得更高,其结果是更多地进行政治参与。本研究中,分析了新媒体群体和传统媒体群体对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弹劾集会参与产生的影响,以及属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个别媒体对弹劾集会参与产生的影响。在分析媒体使用对参与弹劾朴槿惠烛光集会产生的影响方面,如果引入媒体组合的概念,可以在线下政治参与和媒体使用模式上获得更多新的启示,这一点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束开荣)

### 注释 [Notes]

1. 在任总统被宪法法院弹劾在韩国宪政史上属首次。
2. 专业被调查人库是在地区、男女、年龄、职业、学历、收入分布中,从统计方面可代表韩国全国人民的被调查人。
3. 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属于支持文在寅总统的进步派。
4. 门户网站新闻页面不能像社交媒体一样进行双向沟通,只能单方面传达信息,因此被分类为传统媒体。
5. JTBC通过2016年10月独家曝光崔顺实使用的平板电脑内涉嫌垄断国政的内容,在触发烛光集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之前TV朝鲜在同年7月首度报道了崔顺实垄断国政相关内容。韩民族新闻也在TV朝鲜之后将后续报道继续了下去。都是在事件初期传统媒体起到突出作用的例子。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崔蕴芳(2009)。《网络舆论形成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北京。
- 李永春(2017)。“崔顺实事件”的原因及其影响探析。《东北亚学刊》，(04)，45-48。
- 毛湛文(2015)。《新媒体事件传播的情感逻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北京。
- 王晓玲(2016)。透过“崔顺实门”看韩国民主。《世界知识》，(23)，28-30。
- 赵刚(2011)。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新特点和规律——以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及其引导机制为观点。《新闻教学与学术研究》，(6)，250-259。
- 张明新，刘伟(2014)。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公共管理学报》，(11)，90-103。
- Barnes, S. H., Kasse, M., & Allerbeck K. R., Farah, B. G., Heunks, F., Inglehart, R., Jennings, M., Klingemann, H., Marsh, A., & Rosenmayr, L.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ennett, W. L. (2012). The 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 political identity, social media,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 Social Science*, 644 (1), 20–39.
- Bimber, B. (2014). Digital media in the Obama campaigns of 2008 and 2012: adaptation to the personaliz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11 (2), 130–150.
- Boulianne, S. (2016). Online news, civic awareness, and engagement in civic and political life. *new media & society*, 18 (9), 1840–1856.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 Bowman, S., & Willis, C. (2003).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Washington: The Media Center.
- Brehm, J., & Rahn, W. M. (1997). Individual 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999–1023.
- Coleman,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143–1168.
- Eltantawy, N., & Wiest, JB (2011). The Arab spring! Social media in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reconsidering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1207–1224.
- Eveland, W. P., & Scheufele, D. A. (2000). Connecting news media use with gaps in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 (3), 215–237.
- Gil de Zúñiga, H., Puig-i-Abril, E., & Rojas, H. (2009). Weblogs, traditional sources onlin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assessment of how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New Media & Society*, 11 (4), 553–574.
- Gil de Zuniga, H., Jung, N., & Valenzuela, S. (2012).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 (3), 319–336.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u, Mee-Young (2016).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Level of Democracy in Asian Countr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16 (3), 77–106.
- Jung, N., Kim, Y., & Gil de Zuniga, H. G. (2011).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and efficacy in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4, 407–430.
- Katz, E., & Gurevitch, M. (1974). Uti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by the individual. In J.G.

- Blumler & E. Katz (Eds.),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 (pp. 19-32). London: Faber.
- Kenski, K., & Stroud, N. J. (2006). Connections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Efficacy,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0 (2), 173–192.
- McLeod, J. M., Scheufele, D. A., Moy, P., Horowitz, E. M., Holbert, R. L., Zhang, W., & Zubric J. (1999). Understanding deliberation the effects of discussion networks on participation in a public foru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 (6), 743–774.
- Milbrath, L. W. and Goel, M. 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Mishler, W., Rose R. (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 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1), 30–62.
-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4). 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 Computers*, 36, 717–731.
- Putnam, R. (1995a). "Bowling Alone.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65.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hn, W. M., Brehm, J., Carlson, N. (1999). *National elections as institutions for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In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ed. Skocpol, Theda, Fiorina, Morris P., 111–6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Rosenstone, Steven J. and John M.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Scheufele, D. A., & Shah, D. V. (2000). Personality strength and social capital – The role of dispositional and informational variabl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ivic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7 (2), 107–131.
- Shah, D. V., Kwak, N., & Holbert, R. L. (2001). “Connecting” and “disconnecting” with civic life: Patter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 141–162.
- Shah, D. V., McLeod, J.M., & Yoon, S.H. (2001). Communication, context, and community: An exploration of print, broadcast, and Internet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 (4), 464–506.
- Shah, D. V. (2005).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age: Modeling internet effects on civic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5), 531–565.
- Uslaner, E. M. (1999). Trust but verify: Social capital and moral behavior.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38, 29–55.

- Valenzuela, S., Park, N., & Kee, K.F. (2009). Is there social capital in a social network site? 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 (4), 875-901.
- Verba, S., Brady, H. E., & Scholzman, K. L.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itak, J., Zube, P., Smock, A., Carr, C. T., Ellison, N., Lampe, C. (2011). It's complicated: Facebook us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2008 electio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 (3), 107-114.
- Wolfsfeld, G., Yarchi M., & Samuel-Azran T. (2016). Political information repertoir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8 (9), 2096-2115.
- 금희조 (2009). 뉴미디어 환경이 개인의 사회정치참여에 미치는 영향: 선유경향과 콘텐츠 선호의 상호작용을 중심으로. <한국언론학보>, 53권 4호, 5-26.
- 금희조 · 조재호 (2010). 스마트폰, 커뮤니케이션 격차, 그리고 정치참여: 소셜 미디어 효과에 대한 스마트폰 이용의 조절 역할을 중심으로. <한국언론학보>, 54권 5호, 349-371.
- 금희조 · 조재호 (2015). 미디어를 통한 뉴스 이용과 대화가 정치 지식, 효능감, 참여에 미치는 영향-미디어의 종류와 대화 채널의 차별적 효과를 중심으로. <한국언론학보>, 59권 3호, 452-481.
- 김상돈 (2006). 정치뉴스매체 활용이 정치제도 신뢰에 미치는 영향. <방송통신연구>, 63호, 113-152.
- 김성태 · 김여진 · 최홍규 · 김형지 (2011). 뉴미디어를 통한 소통 채널의 확장과 정치참여 변화 연구. <평화연구>, 2011년 봄호, 5-38.
- 김은이 · 정선영 · 문원기 (2015). SNS, 사회자본 네트워크 유형, 그리고 정치참여: SNS(트위터와 페이스북)의 유형별 비교를 중심으로. <사회과학연구>, 39권 1호, 175-200.
- 김현정 · 원영아 (2015). 전통적 미디어에 대한 신뢰가 정치적 참여에 미치는 영향. <언론과학연구>, 15권 4호, 57-78.
- 신소연 · 이상우 (2012). 트위터와 페이스북 이용자들이 형성하는 사회자본 유형이 정치참여에 미치는 영향. <사이버커뮤니케이션학보>, 29권 4호, 191-232.
- 심홍진 (2012). <소셜 미디어의 정치 참여 효과에 관한 연구: 내적·외적 설득 요인을 중심으로>. 연세대학교 대학원 박사학위 논문.
- 안명규 · 류정호 (2007). 인터넷 정치참여 요인에 관한 탐색적 연구: 대학생 이용자의 정치심리변수와 인터넷 사회자본을 중심으로. <사이버커뮤니케이션학보>, 23호, 113-148.
- 윤성이 (2013). SNS 정치참여 연구 동향. <정보화정책>, 20권 2호, 3-19.
- 이동희 · 황성욱 (2013). 정치 팟캐스트 콘텐츠 '나는 꿈수다'의 이용 동기와 온·오프라인 정치 참여: 서울 지역 2040세대 이용자 서베이를 중심으로. <미디어, 젠더 & 문화>.

26호, 141-175.

이병혜 (2013). 소셜미디어의 이용이 정치참여에 미치는 영향: 대학생집단의 정치효능감과 정치참여를 중심으로. <정치커뮤니케이션 연구>, 30호, 319-353.

이숙종 · 유희정 (2010). 개인의 사회자본이 정치참여에 미치는 영향. <한국정치학회보>, 44집 4호, 287-313.

정낙원 (2013). 대학생들의 소셜 미디어 이용의 정치참여 효과 메커니즘 분석: ‘친구들’을 통한 정보습득과 규범 인지를 중심으로. <사회과학연구>, 24권 2호, 273-294.

JTBC(2017.12.6.). “다양성과 포용성의 집회문화”...‘1700만 촛불’에 인권상 [http://news.jtbc.joins.com/article/article.aspx?news\\_id=NB11559731](http://news.jtbc.joins.com/article/article.aspx?news_id=NB11559731)

조은희 (2014). 인터넷 이용자의 뉴스 이용 레퍼토리와 사회정치참여. <한국언론학보>, 58권 2호, 64-87.

천혜선 · 박남수 · 이현주 (2014). 다매체 뉴스이용과 사회적 네트워크 정치토론이 사회정치참여에 미치는 영향-동질적·이질적 네트워크와의 정치대화의 조절효과. <한국방송학보>, 28권 5호, 197-236.